

二秦城民暴动的性质和特点

——北魏末期人民大起义研究之三

唐长孺 黄惠贤

我们在前两篇论文中论述过北镇镇民暴动和山胡、敕勒起义，这里准备探讨秦陇反魏起义，特别是二秦城民暴动的性质和特点。

一、秦陇地区反魏起义的概况^①

秦陇地区反魏起义最先发难的是秦州(上邽)城民。肃宗正光五年(公元524年)三月破落汗拔陵起兵后，二夏、幽、凉等州纷纷响应。四月，高平镇民赫连恩反，推酋长胡琛为高平王，率众攻高平响应拔陵。胡琛为魏将卢祖迁所败，北撤。这时，秦州刺史李彦“刑政过猛，为下所怨”，六月，城民薛珍、刘庆、杜超(或作杜迁)等起兵，推城民莫折太提为帅。太提称秦王，杀了李彦。又派遣城民卜朝(或作卜胡)袭取高平，杀镇将赫连略、行台高元荣。太提死，子念生代立，称天子，改元“天建”，设置百官，以子阿胡为太子，兄阿倪为西河王，弟天生为高阳王^②，伯珍为东郡王，安保为平阳王。七月，念生遣天生东下，与魏征西都督、雍州刺史元志对峙于陇口。八月，天生大败魏军于陇东，元志退守岐州。十一月，岐州城民开城迎接天生，擒都督元志、刺史裴芬之。天生自己率军东下，直趋雍州，屯营黑水；又遣别帅卜朝、王庆云从北道下泾州，大败魏光禄大夫薛密于平凉东。义军两路东下，泾、雍二州吃紧，关中动摇，洛阳政权十分恐慌。

早在莫折太提暴动之前，南秦州氏民就爆发了反魏起义。当时，南秦刺史崔游诱杀氏豪、州主簿杨松柏兄弟，以致“合境皆反”。就在莫折太提起义之后几天，南秦州(骆谷)城民韩祖香、张长命、孙赭(或作孙掩)等攻入州馆，杀崔游，据城响应太提。七、八月间，莫折念生曾两次派都督杨柏年、樊元、张朗和窦双率兵攻仇鸠、河池戍和盘头郡，接应南秦城民，虽都被魏东益州刺史魏子建将打败，骆谷城仍为城民据守，南秦氏民暴动势力也依然存在。同年七月，凉州城民万于菩提、呼延雄等执刺史宋颖，据州城以响应莫折念生。宋颖勾结吐谷浑主伏连筹进攻凉州，万于菩提被杀，城民赵天安又推宋颖为刺史，这里的暴动很快就被镇压了^③。到正光五年十一月，秦州义军向西、向南的进展虽不大，但以上邽城为根本，北据高平，南连骆谷，东下岐州，连续击败魏军，直抵黑水，兵势发展十分迅速。

正光五年十一月末，高平人袭杀卜朝，迎胡琛，念生失高平镇。十二月，东益刺史魏子建招降南秦氏民，占领六郡十二戍；又攻杀骆谷城民领袖韩祖香，“张长命畏逼，告降于肖宝夤”。孝昌元年（公元525年）正月，莫折天生与魏尚书左仆射、西道行台大都督肖宝夤、都督崔延伯大战于黑水，义军战败，阵亡被俘者近十万人^④，天生退回陇右。

秦州义军在东、北两路遭受挫折时，曾力图向西、向南发展。正光五年十二月，念生派兵攻凉州，城民赵天安执刺史宋颖响应。孝昌元年十月，伏连筹又派兵救宋颖，天安反复，凉州又归北魏^⑤。这时，魏河州刺史元祚死，前刺史梁钊子景进引念生兵围抱罕，河州长史元治平等推高徽行州事，勒兵固守；又求救于吐谷浑，伏连筹派兵至抱罕，景进兵败东走^⑥。孝昌元年二月和八月，念生又曾两次派遣都督杨鲔、梁下弁、姜齐和杜黑儿、杜光带兵南攻仇池郡，但都被魏子建所败。西、南两路无进展。

尤其是在莫折天生兵败黑水的关键时刻，义军内部出了叛徒。据《魏书》卷59《肖宝夤传》说，天水人吕伯度兄弟起先参加了起义，不久就背叛义军，聚众保显亲。被念生击败，降于胡琛。胡琛封他为秦王，资助他人马，还攻秦州，败念生将杜粲于成纪、金城王莫折普贤于水洛城，重又盘踞显亲。念生率大军反击，又被打败。这个叛徒煽起了秦州、高平两支义军的仇杀，背叛念生之后复叛胡琛，偷袭琛将刘拔，随即派侄儿吕忻和勾引魏军西来。念生事迫，于孝昌二年（公元526年）九月诈降于肖宝夤。宝夤派行台左丞崔士和入秦州。至此，莫折氏独立领导的秦州义军归于失败。

正当秦州义军由盛转衰时，高平胡琛领导的山胡起义军有了迅速的发展。正光五年十月，胡琛遣将宿勤明达东下攻豳、夏、北华三州。十一月，胡琛进据高平镇。孝昌元年四月，胡琛遣大将万俟丑奴、宿勤明达攻泾州，大败魏军于安定，阵斩骁将崔延伯。史称“大‘寇’未平，复失骁将”，义军军势“愈盛”，“朝野为之忧恐”。

孝昌二年九月，莫折念生再次占领秦州，把崔士和送往高平处死。从此，“胡琛与莫折念生交通”，高平、上邽两支义军合并，秦陇起义进入新的联合发展的阶段。这时，义军大将万俟丑奴擒斩魏泾州刺史、叛徒吕伯度，兵威大振。胡琛死后，丑奴总领义众。

三年正月，高平、上邽义军大败肖宝夤、元恒芝于泾州。魏大陇都督、南平王仲冏，小陇都督高聿相继退散，肖宝夤收拾残兵万余退守长安。莫折念生率众攻汧城，魏守将潘义渊降；接着进军岐州，城民执刺史魏兰根开门迎接，乘胜逼雍州。这时，魏北海王元颢、夏州刺史源子雍、豳州刺史毕祖晖、行台辛深等，纷纷弃城逃窜。于是，胡引祖占据北华州，叱干麒麟占据豳州。宿勤明达侄、南平王宿勤乌过仁略地渭北。东下的南北两路义军进展顺利，“关中大扰”，形成义军发展的新高潮^⑦。

不久，莫折天生中暗箭阵亡于雍州^⑧，宿勤乌过仁亦因毛鸿宾叛变而被俘，南北义军都受到挫折。以后义军虽曾一度占领潼关，仍不得不于三月主动撤退。九月，秦州城民杜粲叛乱，杀莫折念生“合门皆尽”^⑨，杜粲自行州事。南秦州城民辛琛（或作辛琛显）亦自行州事，遣使降于肖宝夤。十二月，秦州民骆超杀杜粲，降于北魏。至此，上邽、骆谷二城都被魏军占领，二秦城民起义军的主力失败了。

魏孝庄帝建义元年（公元528年）七月，万俟丑奴称天子，置官属，改元神兽。次年（永安二年、公元529年）九月攻克东秦州，杀刺史高子朗。三年三月，丑奴大行台尉迟菩萨攻岐州，被贺拔岳打败。四月，魏雍州刺史尔朱天光至安定，丑奴泾州刺史侯几长

贵叛降，丑奴奔平亭西走高平，天光遣贺拔岳追击，丑奴在平凉兵败被俘，牺牲于洛阳。丑奴败后，其行台万俟道洛投归王庆云。王庆云大概是屠谷胡人，本是莫折念生的部将，秦州起义军主力虽已失败，他仍然据守水洛城。道洛投归庆云，实际上是上邽、高平两支义军的最后联合抗战，水洛城也是最后的据点。这年六月，庆云称帝，以道洛为大将军。七月，尔朱天光攻陷水洛，庆云、道洛被俘，天光坑杀城民一万七千人，又“分其家口”。大概在水洛城陷之先，二秦城民都曾谋杀刺史未遂，这时也都被尔朱天光所镇压。后来元暹为秦州刺史，认为上邽城民“累为反复”，大肆屠杀，“存者十一二”^⑩。

万俟丑奴部将宿勤明达在东夏州，坚持到魏节闵帝普泰元年(公元531年)四月，才被尔朱天光镇压。但是秦陇起义还有后劲，史籍记载，莫折后炽在泾、原(高平镇改)之间坚持斗争，直到西魏大统四年(公元538年)才被镇压^⑪。

山胡起义，我们在前一篇论文中已经谈过，这里不再重复。仅就秦陇起义而言，可以孝昌二年(公元526年)九月莫折念生第二次起兵反魏为界线，划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莫折太提、莫折念生独立领导的以上邽城民为骨干的秦州大暴动。其中，从正光五年(公元524年)六月至十一月是迅速发展时期；正光五年十一月至孝昌二年九月是由盛转衰时期。第二阶段是莫折念生领导的秦州暴动军和胡琛、万俟丑奴领导的山胡起义军合作阶段。孝昌三年正月，义军攻占泾、豳、岐、北华等州，达到高潮；至孝庄帝永安三年(公元530年)七月，水洛城失陷，王庆云、万俟道洛牺牲而基本结束。此后，宿勤明达艰苦奋战于东夏，莫折后炽转战于泾、原，已是大起义的尾声。

从莫折太提于正光五年六月发难，到永安三年七月王庆云牺牲，斗争坚持了整整六年，如果推延到莫折后炽被镇压，那就有十四年之久。

二、二秦城民暴动的性质

关于二秦城民暴动的性质，《通鉴》卷150梁武帝普通五年(公元524年)七月条有这样的记述：

“东益州本氐王杨绍先之国，将佐皆以城民劲勇，二秦反者皆其族类，请先收其器械。(东益州刺史魏)子建曰：‘城民数经行陈，抚之足以为用，急之则腹背为患’。乃悉召城民慰谕之；既而渐分其父兄子弟外戍诸郡，内外相顾，卒无叛者。”

《通鉴》把上邽、骆谷两城暴动的城民，说成都是氐王杨绍先的“族类”，即二秦氐民“叛乱”。这种看法可能出于误解，但对后世却很有影响。

首先，南秦氐民、城民暴动的主要资料出自《魏书》卷57《崔游传》，传称：

“正光中，起除右将军、南秦州刺史，固辞不免。先是州人杨松柏、杨洛德兄弟数为反叛，游至州，深加招慰。松柏归款，引为主簿，稍以辞色诱之，兄弟俱至。松柏既州之豪帅，感游恩迁，奖励群氐，咸来归款；且以过在前政，不复自疑。游乃因宴会，一时俱斩，于是外人以其不信，合境皆反。正光五年夏，秦州城人杀刺史李彦据州为逆。数日之后，游知必不定，谋欲出外，寻为城人韩祖香、孙祿攻于州馆。……寻为祖香等所执害，时年五十二。”

《魏书·肃宗纪》也说韩祖香等“杀刺史崔游以应太提”，他们响应秦州城民暴动而起兵是

很清楚的。至于“合境皆反”的氏民暴动，则是因为崔游诱杀了氏豪杨松柏。前者是“城民”暴动，后者是氏民（即“外人”或“土人”）造反，两者可能相互有关，但却是不同的事件。据《魏书》卷78《张普惠传》的记载，当时南秦反魏的氏民明显地是在氏族酋豪杨公熙、吴富等人的影响、控制之下。正光五年十二月，《肃宗纪》称：

“山南行台、东益州刺史魏子建招降南秦氏民，复六郡十二戍；又斩贼王韩祖香。南秦贼王张长命畏逼，乃告降于肖宝夤。”

很明显，先是南秦氏民在氏豪控制下投降了魏军，于是南秦全境（六郡十二戍）被魏军占领；骆谷成了孤城，城民起义军处于绝境，韩祖香英勇牺牲，张长命动摇投降。北魏政府采取不同的镇压手段和两支反魏武装失败的过程，反映了“城民”和“外人”（即氏民或“土人”）之间的明显区别。

其次，二秦城民暴动也不是单纯的氏、羌人民种族性质的起义。二秦城民的种族属性，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我们不妨从参加暴动的城民姓氏上作一些考订和推测。从上节起义经过中我们看到，上邽暴动城民的主要领袖是莫折念生父子兄弟。莫折氏，《元和姓纂》辑本卷10“十九铎·莫折”条载：“本羌姓，代居渭州襄城。后魏秦州刺史莫折大提”。又《梁书》卷39《羊侃传》称：“时，秦州羌有莫遮念生者，据州反，称帝。”“莫遮”为“莫折”异译，莫折氏为羌族无疑。《姓纂》称莫折氏“代居渭州襄城”。按渭州无襄城，疑为襄武之误。《太平寰宇记》卷151“渭州襄武县”条：“先零遗种居之”；又说：“五谿聚，即杨盛分羌为部以五谿，每谿一聚。”又上引《姓纂》“莫者”条引《西秦录》有“右卫将军莫者羗羗、西安太守莫者幼春、尚书郎中莫者阿胡”。陇西襄武，本西秦属地，“莫者”亦为“莫折”异译。莫折氏是陇西羌族大姓，西秦政权需要吸收他们来进行统治。除莫折氏外，秦州城民有姓名可考的还有薛珍、刘庆、杜超、卜朝和杜粲，其中姓杜的两人。杜虽汉姓，但也有其它种族。《华阳国志》卷9《李特志》称：“魏武定汉中，曾祖父虎与杜（覆）、朴胡、（袁）约、杨车、李黑等移于略阳，北土号曰巴人”^⑫。又《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有“河西鲜卑杜崱”；《魏书》卷113《官氏志》称：“西方独孤浑氏后改为杜氏”；北镇起义领袖之一的柔玄镇人杜洛周，《梁书》卷56《侯景传》中作“吐斤洛周”，当然是鲜卑人^⑬。薛有汉姓，有当时居于河东的“蜀薛”，还有鲜卑。《魏书》卷113《官氏志》称“叱干氏后改为薛氏”，《晋书》卷117《姚兴载记》载有处于秦、魏之间的鲜卑薛勃，《魏书》卷44有传的薛野猪称为代人，大概都出自叱干氏。至于西北卜氏出于匈奴须卜氏，刘氏当时多匈奴改姓，无须多说。如此，则秦州城民除莫折可以确证为羌族外，其它诸姓虽不能确知，似兼有氏、汉、鲜卑和匈奴。骆谷暴动城民姓名可考者有张长命、韩祖香、孙濂和辛琛。张、韩、孙、辛都是汉姓。张氏有姓胡的嫌疑^⑭，但在当地却未见匈奴或乌丸张氏的活动。《晋书》卷114《苻坚载记》有“武都氏豪张熙”。武都属秦州，张长命也可能是当地氏人。上述考释与推论如果能够成立，那么，上邽、骆谷的城民不仅有氏、羌，还包括汉、匈奴和鲜卑等各个种族。“族类”复杂，不仅不能用氏王杨绍先的“族类”来概括，“羌氏人民”的概念也显然是容纳不了的。

第三，“城民”不是某一个或两个种族的别称，而是当时一种独特政治身分的人们的专有名词。《北史》卷56《魏收传》载收父魏子建为东益州刺史，称：

“正光五年，南北二秦城人莫折念生、韩祖香、张长命相继构逆。金以州城之人，莫

不劲勇，同类悉反，宜先收其器械。子建以为城人数当行阵，尽皆骁果，安之足以用，急之腹背为忧。乃悉召居城老壮晓示之；并上言诸城人本非罪坐而来者，悉求听免，明帝优诏从之。子建渐分其父兄弟外居郡戍，内外相顾，终获保全。”

“州城之人”，“同类悉反”，很显然，当时人认为这是一次“城民”的“暴乱”。同时，《魏收传》还说明：东益州的城民，不仅“数当行阵”，“尽皆骁果”，平时也拥有“器械”，常备戍守，他们是经常服兵役的人；他们和家属居住在一起，而且是武兴城（东益州的州治）里的主要住户；城民之中一部分是“罪坐而来”的人户，因而意味着城民的身份比一般编户低。上述东益州城民的这些特点，也是诸州镇城民最一般的特点。因此，种类混杂，实非“同类”而属“杂人”的城民，从身份和处境而言，又确实属于“同类”了。

第四，秦陇起义首先由上邽城民发难，并以秦州为中心向四方扩展，秦州卷入暴动的群众很多，仅莫折天生统率东下的就有近十万之众，他们不可能都是城民。除前面谈过的上邽城民外，我们有必要再来分析一下莫折念生部下、有名可考但不能确定是否城民的将领。（一）、《魏书·薛峦传》有念生“别帅”王庆云；《魏书·孝庄纪》永安三年（公元530年）六月载“白马龙涸胡王庆云僭大位于水洛城”；《魏书·尔朱天光传》又称王庆云为“略阳贼帅”。水洛城在上邽、略阳之间，距莫折念生暴动中心很近，莫折普贤就曾据守此城，三处记载应属一人。白马龙涸之地，族类极为复杂。《华阳国志·大同志》载晋泰始三年（公元267年）“汶山白马胡纵掠诸种”，虽然白马氏、白马羌比较著名，但此地确有胡人^⑮。白马龙涸胡的意思，大概是指居住在龙涸的白马胡。他们大概很早就迁到略阳，据有水洛^⑯。（二）、《魏书·肖宝夤传》载天水人吕伯度兄弟“始共念生罔逆”，后背叛念生，聚众保显亲。人所共知，建立后凉政权的吕光就是“略阳氏人”。《晋书》卷125《乞伏炽磐载记》有“显亲休官吕奴迦”，休官本氏种，伯度必是显亲氏人^⑰。（三）、还有叛徒骆超，见《魏书·肃宗纪》。杜粲杀害念生后又被骆超所杀，并以上邽降魏，当上了秦州刺史^⑱。这是一场叛徒间争夺降魏“首功”的厮杀。后来，宇文泰派骆超到洛阳，终于被高欢杀掉。骆超的老婆陆令萱，陆也是鲜卑贵姓^⑲，《魏书·官氏志》称“他骆拔氏，后改骆氏”，可证骆是鲜卑人。（四）、据《魏书·肃宗纪》，念生部下还有都督杨伯年、杨鲜、杜黑儿、杜光、樊元、张朗、寔双、梁下弁和姜齐等。这个地区的杨氏当是氏人，和仇池氏酋杨氏疑是一族。其他诸姓和杨姓一样，汉姓皆有之，但据史传所载又是其它族特别是氏、羌族的姓，这里不再一一论述^⑳。

从莫折念生将领们的姓氏推测，虽以羌、氏为多，但也包括汉、胡和鲜卑等族。其中有些就是城民，当然更多的应是秦州的编户。这些将领中除王庆云有一处提到他是胡人外，其它均不注明种族，种族的传统可能还有不小的影响，但他们长期以来都是编户，是封建国家、州郡官吏租调徭役的征发对象，他们所遭受的主要是阶级的压迫。因此，从秦州这个起义发展最充分的地方来看，无论城民还是编户，他们在种族上决不是单纯的“羌夷”，而是“杂人”，种族界线是不明显的。城民和编户遭受的剥削、奴役的程度虽不尽同，但同样来自北魏封建政府，其被迫反抗，主要是阶级矛盾激化的表现。因此，以上邽城民为骨干的秦陇起义虽由于这一地区居民种族复杂而带有民族斗争的色彩，但本质上是武装的阶级斗争。其实，这一点当时人也普遍是这么看的，《魏书》记载中除王庆云外，从未提到起义首领的族类，而同书中叙述过去同一地区的暴动，总是明确指出其

为休官、屠各、氐、羌等等。当时墓志述及这次起义也没有说到和当时各族的关系,《元暕墓志》只说“秦川构乱,巨滑滔天”^②,《元朗墓志》叫嚷“陇贼未夷,秦妖尚蠢,雍华之民,屡相扇动”^③,《元寿安墓志》也只说“陇右虔刘,阻兵称乱”^④。这些墓志提到秦陇起义,绝不涉及种族,甚至连最一般的“西戎”、“西夷”之类的字眼也很少用上,显然,作者们是把它当作一次一般的人民起义来咒骂的。

最后,关于秦陇起义的性质还可以从破坏和镇压起义的势力中得到说明。宕昌羌豪梁景进和显亲氏豪吕伯度混入义军、破坏起义的事迹前面已经说过,这里再谈一下北地酋豪毛鸿宾兄弟。《北史》卷49《毛遐传》载:

“毛遐字鸿远,北地三原人也。世为酋帅。……传至遐,四世不绝。正光中,肖宝夤为大都督,讨关中诸贼,咸阳太守韦邃时为都督,以遐为都督府长史。宝夤败还长安,三辅骚扰。遐因辞邃还北地,与弟鸿宾聚乡曲豪杰,遂东西略地,氐羌多赴之,共推鸿宾为盟主。既而贼帅宿勤买奴自号京兆王於北地,遐诈降之,而与鸿宾攻其壁。贼自相斫射,纵兵追击,七栅皆平。”

《魏书》卷58《杨侃传》亦载此事^⑤,情节虽有些出入,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世代酋豪的毛鸿宾兄弟,先是混入义军,希图割据北地;继而背叛并镇压义军,因“功”毛鸿宾兄弟均为州刺史。这段经历和梁景进、吕伯度几乎是一样的。除此之外,我们找不到各族酋豪在义军中活动的明确记载,相反,却有材料说明他参加了镇压活动。《北史》卷96《氐传》载:

“(杨公熙)后为假节、别将,与都督元志同守岐州,为秦贼莫折天生所虏,死于秦州。”

杨公熙是仇池氐王杨难当的重孙。伯父杨大眼为高祖、世宗时骁将,《魏书》卷73有传:父小眼,曾为天水太守。正光中,杨公熙曾勾结氐豪吴富阻扰张普惠运粮东益、南秦^⑥,与北魏朝廷是有矛盾的。但在城民暴动迅速发展时,却投入官军,在镇压义军中甘以身殉。又《周书》卷28《权景宣传》:

“权景宣字晖远,天水显亲人也。父昙腾,魏陇西太守,赠秦州刺史。景宣少聪悟,有气侠,宗党皆叹异之。年十七,魏行台肖宝夤见而奇之,表为轻车将军。”

据《魏书·肃宗纪》,权景宣投入魏军当在孝昌元年(公元525年)正月至三年十月之间。显亲权氏本是休官豪帅^⑦,景宣少有“气侠”,宗党叹异;父昙腾曾任陇西太守,当为氐豪无疑。又《北齐书》卷27《金祚传》:

“金祚字神敬,安定人也。性骁勇,命气任侠。魏正光中,陇右贼起,诏雍州刺史元猛讨之,召募狼(良?)家以为军导,祚应选,以军功累迁龙骧将军、灵州刺史。”

《北史》卷15《河间公齐附孙志传》称:元志字猛略,正光中为雍州刺史。《金祚传》之元猛,当为元猛略之双名单称。按平凉金氏,本匈奴休屠王之后,即匈奴屠各族,或作休屠^⑧。金祚疑为安定屠各酋豪。又《周书》卷23《苏椿传》:

“正光中,关中贼乱,椿应募讨之,授荡冠将军。”

椿,苏绰之弟。苏氏为武功士族,“累世二千石”^⑨。武功为岐州属郡,正光末,天生出陇围岐州,苏椿或在此时应募。如上所述,上邦城民起义,南秦、岐、凉城民和秦州编户纷纷响应;而氐羌酋豪梁氏、吕氏、毛氏从中破坏,氐酋杨氏、屠各豪帅和武功士

族都应募参加魏军，共同镇压起义，其阶级对垒是鲜明的。

三、二秦城民暴动的特点

我们论述并强调秦陇起义的阶级斗争性质，同时也承认起义军存在着民族的、地域的特点。在《试论北魏末年北镇暴动的性质》一文中谈过，北镇镇民是由鲜卑拓跋部人和迁徙的“良家首附”、流配犯人三种势力组成，其中拓跋部民为骨干，这种情况还可从魏末凉州(姑臧镇改)响应起义的城民姓上得到证实。可是，上邽、骆谷的情况不同，作为秦陇起义最主要的领袖、将领，上邽城民莫折念生父子兄弟是羌人，其它城民从姓氏上看，可以确定为拓跋部人的很少，他们更多的像氐、羌、汉、胡和河西鲜卑，这是一个明显的特点。这一特点的客观存在，必有其产生的社会和历史原因。

上邽是天水郡治所，东晋第二次设置秦州，又成为州治所。在北魏势力伸展到这里前，它是赫连夏的西部重镇。骆谷城在上邽以南的仇池，这里一向是所谓百顷氐杨氏的统治地区。太武帝拓跋焘神䴥四年(公元431年)消灭了赫连夏在陇右的残余势力，仇池氐杨难当乘机进占上邽，直到太延二年(公元436年)才撤退^②。以后，北魏利用杨难当和他侄儿保宗之间的矛盾分裂杨氏势力。恰好杨难当挑动和刘宋的战争，被刘宋逐出仇池，北魏以援助杨氏为名，派兵击退宋军，占领仇池，立杨保宗为王。这是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2年)的事。就在这年，保宗图谋反魏，被擒送代京。于是设置仇池镇，治骆谷城(后改置南秦州)。从公元431至442年整整经过十年的经营，氐酋杨氏的主要势力被排挤出上邽、骆谷二城，北魏派遣封敕文为秦益二州刺史镇上邽，皮豹子为仇池镇将守骆谷。杨氏势力退到骆谷之南。

北魏占领上邽后不久，这里爆发了一次矛盾复杂的武装斗争。《魏书》卷51《封敕文传》载：

“金城边冏、天水梁会谋反，扇动秦益二州杂人万余户，据上邽东城(南城)^③，攻逼西城。……冏、会复率众四千攻城；氐羌一万屯于南岭，休官、屠各及诸杂户二万余人屯于北岭，为冏等形援。……敕文分兵二百人突入南城，……贼余众开门出走，奔入东城。……敕文表曰：‘安定逆贼帅路那罗遣使齎书与逆帅梁会，……称募集众旅，剋期助会。又仇池城民李洪自称应王，天授玉玺，擅作符书，诳惑百姓。梁会遣使招引杨文德，而文德……云，李洪自称应王，两雄不并，若欲须我，先杀李洪，我当自往。梁会欲引致文德，诱说李洪来入东城，即斩洪首送与文德。仇池镇将淮阳公臣豹子遣使……来达臣镇，称杨文德受刘义隆职爵，领兵聚众，在仇池境中，沮动民人，规窃城镇。……臣备边镇，与贼相持，贼在东城，隔墙而已。但以腹背有敌，……伏愿天鉴，时遣大军，助臣翦诛。’表未及报，梁会谋欲逃遁。……会知人心沮坏，于是分遁。敕文纵骑蹙之，死者大半，俘获四千五百余口。”

据《魏书·世祖纪》，边冏、梁会起义发生在太平真君七年三月。五月，东城失守，梁会败走汉中。这次起义，中心在上邽，东面得到安定路那罗、略阳王元达的响应，南面得到仇池李洪、杨文德的支援，时间虽短，影响较大。

边冏，金城人。金城边氏，本是凉州著姓^④。梁会，天水人。梁氏也是安定大姓，

与上邽邻近。而《华阳国志·大同志》例举天水、略阳等秦州六郡氏叟大姓，梁氏为首^②，此外还有宕昌羌梁氏，已如前述。但从梁会与氏酋杨文德联系密切，失败后又逃往当时氏民聚居地汉中来推测，他可能是当地氏人。

“秦益二州杂人万余户”是边陲、梁会起义的基本力量。“杂人”，从十六国以来在关陇地区是常用词，指的是相互错居的各种族人^③。秦陇本是种族复杂的地区，封敕文为秦益二州刺史，兼领护西夷校尉，就有种族统制的职能，那里有被称为“杂人”的各族人是当然的。值得注意的是，传文前称“杂人”，后称“杂户”，而且与氏、羌、休官、屠各各族援军明确区分，似乎他们虽可能出于上述各族，却又另成一类。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所谓“杂人”除了表明种族复杂之外，还有什么含义？这个问题尚待探讨，这里只能试作一些推测：（一）、这些被称为“杂人”的各族人早已错居，风俗习惯互相影响，各自的民族特徵不太鲜明，但还不是混然无别，他们是处于民族融合过程中的汉族和其它各族人，一个明显的现象是汉姓被普遍采用。（二）、“杂人”是以户计算的。万余户的“秦益杂人”都是从二州境内各地集合到上邽来的么？看来不大可能。因为“杂人”是这次起义的基本群众，至少有不小的部分原来就在上邽，而不是自远方奔赴。而且，据本传所述，起义刚爆发，边陲就率万余户“杂人”占领了上邽的东城和南城。南城陷落后，起义军仍然坚守东城。最后东城失守，起义也就归于失败。上邽东城看来是起义军最先发动和最后据守的基地，因此，是否可以认为边陲、梁会以及他们率领的“杂人”中一部分原来就是东城的住户？假使这一推测能够成立，那么名为“秦益杂人”的一部分即是秦州最早的城民。其所以仍称“秦益杂人”，可能由于万余户并非都住在城内，城民也不是全部参加起义，而且他们迁来不久。迁徙秦益诸地“杂人”我们未见记载，但据《封敕文传》和《世祖纪》，就在起义的前一年，敕文攻占枹罕，虏吐谷浑主拾归的妻子及其民户，“分徙千家于上邽”，可知上邽确有当作俘虏迁徙来的民户。枹罕自来就是羌民居地，从那里迁徙来的“民户”，自然并非全是吐谷浑人。本传还提到李洪是仇池“城民”，如果边陲、梁会和“秦益杂人”部分也是城民的话，这次暴动，“城民”不仅起了首创作用，而且也是暴动的主力。

路那罗，据《魏书·世祖纪》，他本是卢水胡盖吴的部将、安定屠各胡帅，真君七年二月盖吴第一次起义失败后，他曾与梁会发生过联系，率领的是一支胡人部队。略阳王元达招引休官、屠各，并推休官王宦兴为秦地王。休官本氏种，屠各为胡人，他率领的是一支氏、胡联合武装。我们还看到，在义军进攻西城时，得到氏、羌、休官、屠各的支援。总之，在暴动中，民族矛盾仍占有明显的地位。

梁会攻打上邽西城时，得到仇池氏酋杨文德的支持。封敕文根据仇池镇将皮豹子的来文，知道杨文德接受了刘义隆的封爵官号。因此，上邽暴动又和氏杨复国、宋魏争夺秦陇的斗争纠缠在一起。《封敕文传》说到，当时仇池一带有三支相互矛盾的武装，一支是皮豹子率领的魏军，一支是支持“城民”李洪的武装，还有一支是氏酋杨文德的军队。李洪“自称应王，天授玉玺，擅作符书，诳惑百姓”，用谶应符书来号召群众，显然与道教有关。据汤用彤先生考释，“李弘”本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利用道教领导农民起义之首领的代名词”^④。就在三十年前，川陕之间发生过得到貳原氏民支持的“妖贼李弘”与氏仇常领导的起义^⑤。我们怀疑《封敕文传》中的“李洪”就是“李弘”，魏收避献文帝讳，改

弘为洪。杨文德认为李洪称王就是和他争夺“州土”，因“两雄不并”，只有“先杀李洪”才愿支援梁会。在他看来，在这一时刻他的主要敌人不是魏军而是“城民李洪”。梁会终于听从文德的要求，诱杀李洪以待文德北上。李洪对梁会是信任的，他轻身进入东城便是明证。上述复杂的活动表明，杨、李、梁三者之间的联系，可能包含着种族的因素；而三者之间的关系，又似乎反映氏酋杨氏传统势力在二秦地区的影响。正是这种影响，促使梁会祇看到杨氏在秦州氏族中的地位，错误地用诱骗手段杀害李洪来换取文德的支持，实际上是通过打击反魏最基本的同盟者而自我削弱，应该是梁会暴动失败的重要教训，这和莫折念生多次派兵南下援助南秦城民的行动正是背道而驰的。

魏军自真君四年占领骆谷后，长期与得到刘宋支持的杨文德争夺仇池。兴安元年（公元452年）刘宋再次经营秦陇，派兵与文德合势从汉中沿嘉陵江北上威胁长安，下一年又进攻武都（仇池西南，今甘肃武都县），《魏书》卷51《皮豹子传》载豹子给文成帝的求援表，从中可以看出魏军几年来在仇池的布署，表称：

“臣所领众，本自不多，唯仰民兵，专恃防固。其统万、安定二镇之众，从戍以来，经三四岁，长安之兵，役过期月，未有代期，衣粮俱尽，形容枯悴，窘迫恋家，逃亡不已，既临寇难，不任攻战。士民奸遁，知臣兵弱，南引文德，共为唇齿。……但承仇池局人，称台军不多，戍兵甚少，诸州杂人，各有还思，军势若及，必自奔逃，进军取城，有易返掌。……愿遣高平突骑，资粮一月，速赴仇池，且可抑折逆民，支对虏贼。须长圉、上邽、安定戍兵至，可得自全。……”

皮豹子表明确提到他统率之兵包括“台军”、“民兵”和“戍兵”三类。所谓“戍兵”，从“役过期月，未有代期，衣粮俱尽，形容枯悴，窘迫恋家，逃亡不已”来分析，他们是单身出戍，衣粮自备，役期一年，期满番代的士卒，这和高祖太和初年薛虎子奏疏所说的彭城戍兵的情况是一致的^⑥。这种戍卒按规有番戍期限，尽管那时延长到三、四年之久，终究是要回本镇的。他们和带着全家老弱留居州镇的城民显然不同。其次，这些戍兵来自长安、安定、统万、上邽诸镇，看来自设置仇池镇以来，战守兵力就依赖西北诸镇的支援。这点也是和北镇不同的。北镇戍守除由代京遣派大军出戍外^⑦，全由城民或府户承担，从未见到来自他镇的番代戍兵。这似乎表明仇池或骆谷此时并不具备比较强大的本镇兵力，也就是没有多少“世习干戈，率多骁勇”的城民。然而城民是有的，《封敕文传》就提到“仇池城民李洪”，皮豹子表中诉说他领兵不多，“唯仰民兵，专恃防固”，所谓“民兵”，很可能就指“城民”。仇池城民的来历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如前所述，从魏末南秦城民首领的姓氏考察，不但不象鲜卑人、匈奴人，而且氏羌也没有看到孙、韩、辛诸姓，他们很象汉族。李洪本是道教“应王”之名，未必真姓李，但道教并非鲜卑、匈奴信奉的宗教。仇池与天师道策源地汉中相邻，在当地氏羌间传播是可能的，但也不排除其为汉人。这些汉族城民较大可能是从外地强迫迁来，但也有可能就是本地居民或早自外地流入的居民^⑧。不管怎样，和上邽城民一样，他们决不是鲜卑拓跋本部的“高门子弟”或“国之肺腑”，也不象“良家酋胄”。

从上引《封敕文传》的记载已看到仇池城民李洪的反魏斗争，又看到以杨文德为代表的地方统治势力决不容许有一支独立于氏酋控制之外的反魏势力存在。这与魏末秦陇起义时南秦州的情况很相似。尽管氏族酋豪也反魏，他们与城民之间在阶级和种族上都存

在尖锐的矛盾。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杨文德勾结刘宋进攻仇池时，皮豹子却能够“唯仰民兵，专恃防固”了。我们还认为杨文德与李洪以及“民兵”之间的矛盾，类似以后在青齐州镇更加突出的“城民”与“土民”之间的矛盾。皮豹子表中说“土民奸通，知臣兵弱，南引文德，共为唇齿”，“土民”疑为“土民”之讹，指散居境内拥护杨氏的氐羌。皮豹子要求速派高平突骑支援仇池，“抑折逆民，支对贼虏”，所谓“逆民”也就是“南引文德”的“土(土)民”。

以上我们初步分析了北魏占领二秦后，在此地区存在的民族的、阶级的以及刘宋、氐杨和北魏间的复杂矛盾，由于这里长期聚居着氐、羌、屠各，因而不同性质的矛盾都带有民族色彩。我们也根据有限而且含糊的记载对上邽、骆谷两城城民的情况作了一些推测，认为两城城民都缺乏鲜卑拓跋部人的痕迹，这点和北镇很不相同。上邽城民似乎开始时一部分即以“秦益杂人”组成，他们与当地氐、羌、休官，屠各关系密切，力量强大。而骆谷城却象有不少汉人，力量不大，北魏经常以西北诸镇兵番戍仇池；我们也看到杨氏在仇池氐羌中的深刻影响，城民和土民间存在着矛盾。这两点和北魏南边诸镇相似，它们既不同于北镇，也与上邽的情况不同。

四、孝文帝改革对二秦地区社会矛盾和 魏末秦陇起义的影响

孝文帝元宏统治时期，随着拓跋国家封建化的加深，相应地强化了对二秦地区的封建统治。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左右，李洪之为秦益二州刺史^⑨，《北史》卷87《酷吏·李洪之传》载：

“至任，设禁奸之制，有带刃行者罪与劫同，轻重品格，各有条章。于是大饗州中豪杰长老，示以法制。……有犯禁者辄捉送州，宣告斩决，其中枉见害者有百数。赤葩渴郎羌深居山谷，虽相羁縻，王人罕到。洪之芟山为道广十余步，示以军行之势。乃兴军临其境，山人惊骇。洪之将数十骑至其里闾，抚其妻子，问所疾苦，因资遣之。众羌喜悦，求编课调，所入十倍于常。”

李洪之在秦州，一面严设科禁，控制编民；一面深入山区，用威胁利诱手段，强使羌民列入编户，交纳租调，从而官府收入增加十倍。但这时秦州郡县，多数仍属羁縻状态。《魏书》卷70《刘藻传》载，刘藻任秦州刺史：

“秦人持险，率多麤暴，或拒课输，或害长吏，自前守宰，率皆依州遥领，不入郡县；藻开示恩信，诛戮豪横，羌氏惮之，守宰于是始得居其旧所。”

据吴廷燮《元魏方镇年表》，刘藻为秦州刺史在太和十七年至二十二年间。本传上称“秦人”，下言“羌氏”说明那时管内羌氏都已是秦州“编户”。虽然如此，北魏政府并不能按常规进行剥削统治。刘藻加强统制，使郡县官各自进驻治所，藉以保证调租征发。羌氏人民按编户交租调服徭役，负担加重了。但是，羌氏人民的编户化，客观上有利于种族区别的逐步削弱。这种趋势，在世宗元恪正始三年(公元506年)吕苟儿、王法智起义中得到反映。《魏书》卷8《世宗纪》正始三年载：

“(正月)秦州民王智等聚众三千，自号王公。寻推秦州主簿吕苟儿为主，年号建明。

……二月，……戊午，诏右卫将军元丽等讨吕苟儿。……六月……乙巳，安西将军元丽大破秦贼，斩贼帅王智五人，枭首六千。……秋七月……庚辰，元丽大破秦贼，降吕苟儿及其王公三十余人，秦泾二州平。”

《北史》卷 17《元丽传》载：

“时，秦州屠各王法智推主簿吕苟儿为主，号建明元年，置立百官，攻逼州郡。泾州人陈瞻亦聚众自称王，号圣明元年。以丽为使持节与杨椿讨之。”

《魏书》卷 58《杨椿传》载：

“秦州羌吕苟儿、泾州屠各陈瞻等聚众反，诏椿为别将隶安西将军元丽讨之。”

王法智暴动和陈瞻暴动有关连，战争涉及秦泾两州，影响较大。《世宗纪》称王法智为“秦州民”，《元丽传》说他是“屠各”；《世宗纪》和《元丽传》称吕苟儿为“秦州主簿”，《杨椿传》说苟儿是“羌”；《元丽传》称“泾州人陈瞻”，《杨椿传》作“屠各”。说明王法智等早已成为编户，但仍可区分其种族，这本是种族融合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我们知道，吕氏本是秦陇氏族著姓，拓跋焘时，上邽就爆发过休官吕丰的暴动^⑩。史称苟儿为羌，是氏羌难弁之一例。同时，作为屠各的王法智，没有拥戴胡人而是举羌人为主帅，则胡羌之间的区别在暴动中也没有发挥作用。又据《魏书》卷 26《李焕传》：“时，氏王杨定进犹据方山，与苟儿影响，焕密募氏赵芒路斩定进。”李焕时为梁州（后改南秦州）刺史。杨定进是“氏王”，则苟儿暴动仍与杨氏复国活动有关。这次暴动似乎没有“城民”参加，可以认为是一次各族联合反魏的斗争，斗争中羌、氏、屠各的影响还是较大的，然而他们早已成为编户，因而在记载中注明他们的种族并非必要。

孝文帝时，仇池一带也有很大变化。太和十二年（公元 488 年），北魏并置梁州于仇池^⑪，以穆亮为镇将，元澄为刺史。《魏书》卷 27《穆亮传》称：

“氏豪杨卜，自延兴以来从军征伐二十一战，前来镇将抑而不用，亮表卜为广业太守，豪右大悦，境内大安。”

同书卷 19 中《任城王云附子澄传》载：

“梁州氏帅杨仲显、婆罗、杨卜兄弟及苻叱盘等，自以居边地险，世为凶狡。澄至州，量彼风俗，诱导怀附。表送婆罗，授仲显循城镇付将，杨卜广业太守，叱盘固道镇付将，自余首帅各随才而用之，款附者赏，违命加诛，于是仇池帖然，西南款顺。”

广业、循城、固道郡镇，都在骆谷城东、嘉陵江西岸，今陕甘接壤处^⑫。杨、苻都是氏族著姓酋豪，据《南齐书》卷 59《氐传》，杨婆罗、阿卜珍（即杨卜）是氏酋杨灵珍之弟。太和元年，刘宋葭芦戍主、氐酋杨文度使弟杨鼠北上，一度占有骆谷。魏以皮喜为仇池镇将，率氏酋杨广香、杨灵珍等南下，至建安，杨鼠弃骆谷走葭芦，皮喜进拔之，斩文度。事后，广香补葭芦戍主，灵珍为仇池镇付将。据《元澄传》、《穆亮传》，杨卜等随兄灵珍参加过太和初对杨文度的战争，灵珍当即选任，杨卜等十年后也得补授。据此，在这里，“量彼风俗，诱导怀附”的怀柔政策，太和初就已推行，但全面贯彻却在十年之后。

这时，北魏守骆谷，控制葭芦，刘宋据武兴，控制洮水。双方各自利用氐酋杨氏的力量，而杨氏也依违于两者之间或自分宗党以对峙^⑬。不过北魏对骆谷控制较为有效，

而刘宋对武兴主要依仗杨氏来羁縻。《元和郡县志》卷22“兴州”条：

“(杨)难当弟伯宜为茹芦王，伯宜孙鼠分王武兴。按武兴即今州理是也。杨鼠既王武兴，又得武都、河池二县之地。鼠子集始称藩于魏，后谋叛魏，魏遂废武兴为藩镇，其年改镇为东益州。”

“茹芦”为“茹芦”即“葭芦”之讹。魏武都镇南有葭芦戍，杨难当弟文度曾为宋葭芦戍主，“葭芦王”或文度自称。据《魏书》卷70《傅竖眼传》、卷101《氐传》、卷66《地形志》，魏灭武兴国为武兴镇，并改镇为州，实在集始之子绍先时，即世宗正始三年（公元506年）。这时，仇池镇也废镇并改梁州为南秦州^④。

秦州守宰深入郡县和仇池州镇并置到废镇为州，其加强政治统治的总趋势是一致的。但是，北魏对南北秦州的具体统治政策和策略的侧重点却有不同：南秦“款附者赏，违命加诛”，着重之点在于对款附氐酋的怀柔；秦州“开示恩信，诛戮豪横”，而以削弱抑制地方势力为主，甚至对“枉掠善良”的将领也“不听追检”^⑤。

北魏对南秦氐酋的怀柔政策当然不能削弱他们对氐民的控制。据《魏书·肃宗纪》、《魏书·薛怀吉传》和《北史·河间王元琛传》，从延昌（公元512—515年）至正光三年（523年），南秦氐人反魏斗争没有间断，规模较大，甚至可以击败象元琛那样兵力较强的政府军。而这些斗争，几乎都是在氐酋影响控制下发生的。前面说过崔游诱杀氐豪激起南秦氐人“合境皆反”的事件。南秦杨松柏和北秦吕苟儿都是州主簿，这是因为孝文帝重订氏族后，羌酋大姓也按士族待迁辟为主簿。秦州暴动，羌人吕苟儿受到本州屠各的拥戴，说明他已经走过从羌族酋豪到州郡世族的历程，他不象杨松柏还是以氐酋身份来控制氐民，而是以州郡世族的地位来影响乡里。《魏书》卷78《张普惠传》载：

“先是仇池、武兴群氐数反，西垂郡戍，租运久绝，诏普惠……送南秦、东益二州兵租分付诸戍，……普惠至南秦，……召秦州兵武四千人，分配四统。令送租兵连营接栅，相继而进，……别遣……员外常侍杨公熙宣劳东益氐民。于时，南秦氐豪吴富聚合凶类，所在邀劫。公熙既至东益，刺史魏子建密与普惠书，言公熙旧是藩国之胤，而诸氐与相见者必有阴私言，宜加图防。普惠乃符摄公熙，令赴南秦。公熙果已密遣其从兄山虎与吴富同逆，又妄自说乡里，纷动群氐，托云与崔南秦有隙，拒而不赴。租达平落，吴富等果协车营，实公熙所潜遣也。”

据本传和《魏书·氐传》。普惠送兵租在正光二至五年间，“崔南秦”当即南秦刺史崔游。崔游诱杀氐酋杨松柏，公熙与之“有隙”，似非托辞。据前引所述，公熙为难当之嫡重孙，即“藩国之胤”，东益“诸氐”与之关系密切；南秦吴富与他也有勾结。他能“纷动群氐”，聚众劫粮，说明氐酋杨氏在仇池、武兴一带仍有很大影响，此地氐民实际上仍处于氏族酋豪的控制之下。

北魏占据二秦后，经过八十年的历史发展，这里的社会矛盾起了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在秦州表现得尤为显著。正光末年的秦州，由于拓跋国家封建化政策的推行，当地酋豪势力受到沉重打击，羌族为主的秦州各族人民日益编户化，种族间的差别逐渐削弱，阶级矛盾成为当地的主要矛盾。我们看到，当边冢、梁会起义时，上邽城内的“杂人”与城外的氐、羌、休官、屠各，既相互援助又互有区别；吕苟儿暴动中，胡羌虽仍可区分，但苟儿并非以羌酋来控制羌民，而是以州郡大姓来影响各族编户；待至莫折太提起义，

除王庆云、莫折念生各有一处提及其种族属性外,所有数十位有姓名可考的城民和将领,他们属于那一种族,都只能从姓氏上加以推测,而且当时的史籍和石刻记载也从不提及这次暴动具有民族性质。这种变化是缓慢的,但是十分深刻、十分明显。这种变化有利于充分发挥上邦城民与当地编户(土民)间固有联系的特点,有利于迅速形成一支以城民为骨干、联合广大编户的起义大军。

南秦的情况与秦州不尽相同。自仇池建镇以后,氏豪杨氏总是力图恢复其统治。正光五年由于刺史崔游诱杀氏豪导致“外人”的“合境皆反”;随后,又由于秦州城民起义激发南秦城民响应。“外人”(城民的对称,即土人)和“城民”之间不可能全无联系,但与秦州不同。秦州人民十余万集中在莫折念生麾下参加战斗,斗争的目的没有什么分歧。南秦却远为复杂,韩祖香等不可能指挥氏豪传统控制下的地方力量,因此,起义后未见向外发展的行动,而是坐待秦州支援。待至正光五年十二月魏子建诱降“反氏”后,南秦城民处于孤立境地,很快遭到镇压。这段历史说明,南秦城民和氏豪控制下的“外人”之间的区别是民族性的,也是阶级性的。这种矛盾的存在,正是南秦城民起义迅速失败的重要原因。

注释:

① “概况”根据《魏书》卷9《肃宗纪》、卷10《孝庄纪》、卷59《肖宝夤传》、卷39《李彦传》、卷61《薛劼传》、卷57《崔游传》、卷73《崔延伯传》、卷33《高徽传》、卷75《尔朱天光传》和《北史》卷56《魏收传》、卷96《吐谷浑传》等并参考《通鉴》写成,一般不另加注。

② 《魏书·肃宗纪》以天生为念生之兄,此处从《魏书·肖宝夤传》。

③ 万于菩提,《北史·吐谷浑传》作“葛于菩提”,“葛于”当作“万于”,即“万于怛”,本拓跋本部贵姓,后改姓“于”。《魏书·肃宗纪》作“于菩提”。又《肃宗纪》称菩提等为“幢帅”,即城民中之下级军官。

④ 《魏书·肃宗纪》称“斩获数万”。同书《肖宝夤传》、《崔延伯传》和《通鉴》卷150梁武帝普通六年正月条都作俘斩“十余万”。

⑤ 赵天安先是把被废黜的刺史宋颖扶出来,接着又反复于莫折念生和吐谷浑之间,看来他只不过是保存实力,以便私图而已。

⑥ 据《魏书·肃宗纪》和《高徽传》,高徽是派往岷州的使节,经过河州,被元治平等推举行州事。据《高徽传》又称:“景进败,退走,奔秦州。景进寻率羌夷复来攻逼,徽遣统军六景相驰表请师,诏徽仍行河州事。久无援救,力屈城陷,为贼所害”。河州终于为梁景进攻下,时间在孝昌元年之后。又梁景进即梁览。《北史》卷49有传。他是宕昌羌的王族,世代酋帅,“家世富豪”,在河州很有势力。《高徽传》说他招引念生围抱罕,《北史》本传却说他散家财招募,镇守河州,记载不同,其实并不矛盾。必是梁景进先打着义军旗号威胁河州,企图夺取刺史的地位。后来攻取了州城,又反过来镇压义军,以博取北魏朝廷的恩典,果然他获得了“世为河州刺史”的特权。梁景进与元祚、高徽,都是统治阶级中人物,他们之间的矛盾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梁景进是宕昌羌,所率领的也是“羌夷”,从种族上说与莫折念生是“同类”,但念生是“城民”,景进是王族,阶级分野明确,又非“同类”,所以先有联系而终于破裂。

⑦ 《魏书·肃宗纪》称东下义军为“高平虏贼”;《通鉴》卷151梁武帝大通元年正月条称“秦贼”。从两书所记义军将领来看,莫折念生、莫折天生自是所谓“秦贼”,而叱干麒麟、宿勤乌过仁等本是高平胡琛部将,又是所谓“虏贼”。从孝昌二年九月“胡琛与莫折念生交通”之后,上邦与高平义军已经联合,此次东下关中正是义军联合行动。

⑧ 据《梁书》卷39《羊侃传》,参考《通鉴》卷151梁武帝大通元年正月条。

⑨ 据《魏书·肖宝夤传》。又杜粲时为莫折念生大将,封常山王。

⑩ 据《魏书》卷19上《京兆王子推附元暹传》称:“庄帝还宫,封汝阳王,迁秦州刺史。先时,秦州城人累为反

复，遍尽诛之，存者十一二。”按元颢之乱，庄帝奔洛阳奔河内，永安二年(529)七月始还宫。次年七月，略超奔秦州奔略阳投尔朱天光。又《魏书》卷11《前废帝纪》，普泰元年(531)三月，节闵帝以侯莫陈悦为秦州刺史。故元颢刺秦州，当在永安三年(530)七月至普泰元年(531)三月之间。

⑪ 《周书》卷25《李贤传》，卷28《史宁传》。

⑫ 《三国魏志》卷1《太祖纪》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九月亦载：“巴氏七姓夷王朴胡、宾邑侯杜薄举巴夷、宾民来降”。

⑬ 参考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四、杜氏条。

⑭ 属于东胡乌丸的张氏，多活动在南皮；属于匈奴屠各的张氏，居住在西河。参见《北朝胡姓考》外篇，东胡和匈奴张氏条。

⑮ 参看《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391—392页。

⑯ 参见陈仲安《王保真墓志考释》，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一期。

⑰ 《陇右金石录》卷1著录北魏某年口遐碑，有“天水吕云合州府氏豪望”之句，同书著录北周建德六年(577)建崇寺造像记，像主姓吕，赐姓宇文，称“亡祖秦州都酋长吕帛泳(?)”，“驃骑大将军南道行台秦州刺史显亲县开国伯兴成。”祖父官都酋长，即因其为氏族酋豪，伯父封显亲县伯，亦因吕氏为天水显亲大姓。

⑱ 《魏书》卷75《尔朱天光传》。

⑲ 《周书》卷1《文帝纪》和《北齐书》卷50《恩幸·穆婆提传》。

⑳ 奚氏有巴氏，见《华阳国志·大同志》；有氏、羌，见《晋书·苻坚载记》和《苻登载记》、《姚萇载记》；又鲜卑纥豆陵改奚氏，见《魏书·官氏志》。樊氏有蛮姓，见《魏书·蛮传》，而《晋书·苻坚载记》有氏豪樊氏。姜氏有羌姓，见《晋书·吐谷浑传》，而《魏书·裴宣传》有武兴氏姜谖。梁氏为宕昌羌，已见注；又是屠各胡姓，见《三国魏志·郭淮传》；又是六郡氏豪之一，见《华阳国志·大同志》。杜、张二氏均见前注，也可能是当地氏人。

㉑㉒㉓ 分别见《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74，92，117之2。

㉔ 《魏书·杨侃传》载：“及肖宝夤等军败，北地功曹毛鸿宾据郡引寇，抄掠渭北。侃启椿白出讨之。……贼见大军率至，众情离解，洪宾遂通书送质，乞求自效。于是擒送宿勤明达兄子贼署南平王乌过仁。”

㉕ 《魏书》卷78《张普惠传》。

㉖ 《晋书》卷125《乞伏炽磐载记》有显亲休官酋豪权小成、权小郎等。

㉗ 参见《北朝胡姓考》第三匈奴·金氏条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389—390页。

㉘ 《周书》卷23《苏绰传》。

㉙ 以上并见《魏书·世祖纪》。《宋书》卷98《氏传》说保宗奔魏，魏“遣袭上邽，难当子顺失守退。”似上邽城直到此时仍为难当所据，与《魏书》不同。

㉚ 《北史》卷37《封敕文传》作“据上邽东城、南城。”《魏书》本传后文亦提及封敕文攻入南城，故依《北史》补。

㉛ 《后汉书·董卓传》有金城边章，李贤注引《献帝春秋》称他为“凉州大人”。

㉜ 又《晋书·苻生载记》：“生以妻梁氏为皇后”，《御览》卷121引《前秦录》：“后，梁安之女孙”。同书《苻坚载记》有秦中书令梁熙、左仆射梁平老。《苻生载记》，苻坚与特进梁平老、强注等杀苻生。《御览》卷295引《前秦录》称，梁熙，说之弟。按梁说曾以中书令为幽州刺史，率氏户镇蓟城。据此，推知梁安、梁说、梁熙、梁平老，并为氏族酋帅。

㉝ 《宋书》卷69《谢灵运传》，灵运上书称：“关西杂居，种类不一，……河北悉是旧户，差无杂人。”可证上说。

㉞ 考释详见汤用彤《康居札记》中“‘妖贼’李弘”条。载《新建设》1961年第六期。

㉟ 见《晋书·姚兴载记》，时间与地点的推定，从汤用彤《康居札记》。

㊱ 《魏书》卷44《薛虎子传》载，太和四年(480年)虎子为彭城镇将、徐州刺史，“时，州镇戍兵，资绢自随”，“资粮之绢，人十二匹”。虎子认为，资绢随身，“用途无准，未及代下，不免饥寒”，建议收兵绢市牛，且耕且戍，“一年之收，过于十倍之绢，暂时之耕，足充数载之食。”说明兵绢每人十二匹，原是戍兵一年口粮之资，从而可以推定戍兵番代之期，实为一年。

㊲ 《魏书》卷41《源贺传》称：“是时，每岁秋冬遣军三道并出，以备北寇，至春中，乃班师。”所谓“是时”，指

献文帝时,大概一向就这样。

③⑧ 《宋书》卷 98《氏传》就提到晋宋之间有“四方流民”进入仇池。《北史》卷 96《氏传》也说“先时,四方流人以仇池丰实,多往依附。”仇池地区虽是氏羌聚居地,也有汉人错居是无疑的。又《水经注》卷 17《渭水篇》有长蛇戍,称“魏(文成帝)和平三年(公元 462 年),徙诸流民以遏陇寇。”《魏书》卷 30《陆真传》亦载,高宗文成帝时,“是时,初置长蛇镇,真率众……卒城长蛇而还。”则陇砦东西,本有迁徙流民或俘虏置镇立戍之共同特点。

③⑨ 参考吴廷璠《元魏方镇年表》(《二十五史补编》第四册)。

④⑩ 《魏书》卷 51《吕罗汉传》。

④⑪ 《魏书》卷 106《地形志》作“渠州”,误。

④⑫ 均见《水经注》卷 20《漾水篇》,参看《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48—49 图。

④⑬ 杨氏自分宗党由来已久,杨难当和杨保宗之间的矛盾就很明显。杨文德依靠刘宋于元嘉 27 年(魏真君 11 年,公元 450 年)自汉中西上,《宋书》卷 98《氏传》说:“文德宗人杨高率阴平、平武诸氏据唐鲁桥以拒文德。文德水陆俱攻,大破之。”显然杨高是站在北魏一边的。

④⑭ 《魏书》卷 66《地形志》下“南秦州”条:“正始初置,治骆谷城。”

④⑮ 《魏书》卷 19 上《元丽传》。

(上接第 52 页)

当然,还可能有许多简化联机检索使用方法的变革。例如在联机条件下帮助用户从数百个数据库中进行选择最合适的数据库的方法。将出现把用户输入的词转换成数据库中有控制的词表中的规范词的机构。还可能出现把一种系统的指令语言中的词转换成另一种用户所不熟悉的系统所要求的词的机构。最后,有可能期望消除目前存在的数据库的生产者和联机检索服务供应商之间的界限,使之成为整体化的联机检索服务工业,等等。

联机检索系统的另一个发展趋势,是它也担负起联机编目的职能。即这个系统既可用来进行情报的检索,也可用来进行图书的编目。英国国家图书馆自动化情报服务——BLAISE 就是这样的一个联机系统。它除了提供检索的功能之外,各个图书馆也可以利用这个系统所拥有的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马尔克和英国马尔克的数据库,核对本馆入藏的新书,联机打印出新书的目录卡片,或向该系统订购计算机缩微输出胶片(COM)目录。这种兼备检索与编目两大功能的联机系统,看来是有广阔前途的。

联机检索系统逐步走向网络化与国际化,看来也是一个确定的发展趋势。这在西欧表现得特别明显。在美国,由于各个大型联机检索系统多数是商业性公司经营的,彼此竞争,互相抵销了不少人力物力。而在西欧,目前正在走情报工作集中化与网络化的道路,有计划地把现有的各联机系统组成网络。例如英国目前正在把国内已有的四大家联机检索系统——不列颠图书馆自动化情报服务系统(BLAISE),英国电气工程师学会的INSPEC系统,德温特专利情报检索系统以及化学情报服务部系统——组成一个叫INFOLINE的网络;而INFOLINE这个全英国的网络,又将纳入全欧经济共同体联机情报检索的大网络——EURONET。这种由单个的联机系统向包含多系统的大网络过渡,有利于克服重复浪费,使联机情报检索的建设达到计划化、协调化和科学化。